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陕西省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第七十五卷

黄帝陵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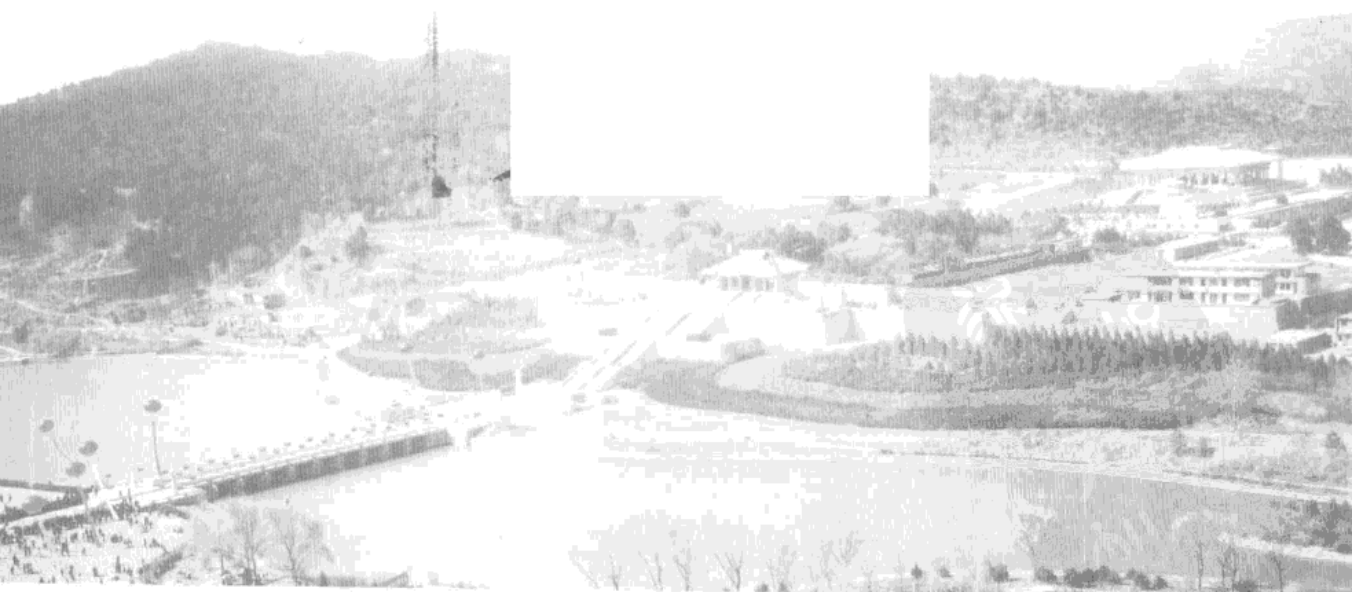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陕西省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第七十五卷

黄帝陵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帝陵志 / 何炳武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24-07003-3

I. 黄... II. 何... III. 黄帝—陵墓—简介
IV. 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6319 号

陕西省志·黄帝陵志

编 著 者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煤航地图制印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33.25 印张 22 插页
字	数	7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24-07003-3/K · 1183
定	价	200.00 元

新华书店

FDG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陈德铭	省长
副	主 任:	赵正永	常务副省长
		周玉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
		刘培仓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委	员:	岳松华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姚 毅	省政协秘书长
		任贤良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康育忠	省军区副参谋长
		陈存根	省人事厅厅长
		刘维隆	省财政厅厅长
		冀东山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胡守贤	省统计局局长
		杜成玺	省档案局局长
		董健桥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张芳斌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焦博武	省地方志办公室纪检组长
		武复兴	省图书馆名誉馆长
		霍松林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陈德铭	省长	
副	主	任：	赵正永	常务副省长
		赵德全	副省长	
		孙天义	黄帝陵基金会会长	
委	员：	薛汉军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玉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	
		张社年	延安市市长	
		张廷皓	省文物局局长	
		余华青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董健桥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朱恪孝	西北大学副校长	
		赵辉远	黄陵县县委书记	

《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薛汉军	
副	主	任：	苏 宇

《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编写组

顾	问：	张岂之	霍松林	石兴邦	
主	编：	何炳武	刘宝才		
常务副主编：	朱恪孝				
编	写：	何炳武	刘宝才	朱恪孝	韩 星
		吴敏霞	李桂民	刘 亮	李笔浪
		李居西	王启和	阎晓红	刘云峰
		任宗财	高院爱	弓长勇	张 光
摄	影：	马振兴	何炳彦	石荣海	

《陕西省志·黄帝陵志》审定单位

初	审：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终	审：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序

陈德铭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之颠。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黄帝陵列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尊崇和向往的圣地。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五千多年前，黄帝部落兴起于今陕西北部地区，后沿洛水南下，东渡黄河进入中原，顺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发展，到达山西南部、山东黄河之滨及河北一带。在部落间战争纷起之时，黄帝以他聪颖的智慧、非凡的才华、开拓的性格，率领其部落，习武为战，保卫自己。与此同时，炎帝部落兴起于今陕西西部地区，后沿渭水、黄河向东发展进入中原，到达河南、山东一带。炎帝部落、黄帝部落以及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在中原相遇而融合，黄帝部落取得了黄河流域各部落的领导地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统一了三大部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共主。我们通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就是从黄帝时代算起的。黄帝时代播百谷，植草木，务农桑，制衣冠，造舟楫，改进弓箭，发展医药，开创了物质文明；造书契（文字），绘图画，作甲子（历法），定算数，制音律，于精神文明卓有贡献；别尊卑，定礼乐，创官制、财产、嫁娶和丧葬等制度，在制度文明方面也有开创之功。黄帝时代结束了蛮荒混沌，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这也是我们尊称黄帝为“人文初祖”的原因。

当然，我们对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要科学地、辩证地理解。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黄帝的众多发明创造，是中华文明开创期的伟大成就，是我们先民许多世代积累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黄帝时代大致处于考古学的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初期。这个时代原始农业长足发展，畜牧业迅速成长，制陶工艺不断进步。同时，出现了政治权威的标志，如文字

的发明、礼器的使用、城堡和宫殿的出现以及随葬品多寡悬殊，等等。结合历史文献，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

从黄帝时代的历史特征出发，经过几千年来不断总结和发展，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黄帝精神，或称为黄帝文化的精神。黄帝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开创精神和凝聚精神。开创精神就是善于开创新事物，以满足历史发展的需要；凝聚精神就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开创与凝聚不可分割，有开创才有发展，才有团结的基础；有团结才有力量开创新事物，推动历史发展。黄帝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文化才能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今天纪念黄帝、祭祀黄帝，是在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尊祖敬宗的民族感情，更是在表达整个中华民族追根溯源的文化认同。今天，黄帝已经是一个文明开启时代的象征，一个文化凝聚的标志。在全球范围内，有这样一个能够被所有中华儿女普遍接受的文化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黄帝既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旗帜，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华儿女相互认同的文化标志。就当前来讲，纪念黄帝，缅怀先祖的丰功伟绩，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激励爱国热情，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时代久远，没有黄帝时代的文字资料直接流传下来。自商、周以后，关于黄帝的传说逐渐见于各类文献典籍，司马迁在《史记》中比较系统地记述了黄帝的事迹。但各类著述记载的都是传说资料，往往笼罩着种种神话的迷雾。《黄帝陵志》的编纂者凭着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拨开神话传说的迷雾，探求历史的本质，尽力进行完整准确地记载和阐述，完成了这样一部系统记述黄帝和黄帝陵的专业志书，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修志目的在于用志。希望广大炎黄子孙阅读这部志，珍惜这部志，了解始祖功德，发扬黄帝精神，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凡 例

一、本志是黄帝陵的专志，记述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境内的黄帝陵的历史和现状。全书分为八章，内容有黄帝传略、黄帝的祭祀、黄帝陵庙、古今黄帝陵庙整修四个部分，并将有关黄帝的资料和研究著述目录作为附录收入。

二、本志记述祭祀黄帝陵的活动，始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迄于公元2004年。

三、本志古代部分使用历代帝王年号纪年，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如：宋仁宗赵祯嘉祐六年（1061）。当代部分使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一般使用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简体字，有特殊必要的地方使用旧体字，碑刻中原缺损的文字用“□”标示。

五、本志附录中黄帝的文献资料均说明出处及版本，以便读者查考。

六、本志记述当代公祭黄帝陵活动时，列出的人名限于省部级以上领导人。本志所见人名一律不加“先生”、“同志”之类称呼。

七、本志配有彩色和黑白照片，编成主页图版，置于正文前。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黄帝传略	(8)
第一节 黄帝的诞生	(8)
第二节 黄帝部落的壮大	(11)
第三节 黄帝与炎帝	(13)
第四节 黄帝与蚩尤	(19)
第五节 黄帝时代的政治建树	(23)
第六节 黄帝时代的物质生活	(27)
第七节 黄帝时代的文化成就	(33)
第八节 黄帝时代的杰出人物	(47)
第九节 黄帝与华夏族	(51)
第十节 黄帝与中国文化	(61)
第二章 黄帝陵	(69)
第一节 黄帝崩 葬桥山	(69)
第二节 黄帝陵周围的考古发现	(71)
第三节 黄帝陵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环境	(77)
第四节 黄帝陵的历史与现状	(79)
第三章 轩辕庙	(83)
第一节 轩辕黄帝庙概说	(83)
第二节 轩辕庙的历史沿革	(85)
第三节 轩辕庙的景观	(87)
第四节 轩辕庙碑刻录	(93)
第四章 黄帝祭祀	(108)
第一节 古代的黄帝祭祀	(108)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黄帝祭祀	(141)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黄帝祭祀	(146)
第五章 黄帝陵祭文	(164)
第一节 明代祭文	(164)

第二节 清代祭文	(166)
第三节 中华民国时期祭文	(173)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祭文	(182)
第六章 历代咏黄帝陵诗词	(210)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210)
第二节 唐宋元时期	(211)
第三节 明代	(212)
第四节 清代	(215)
第五节 中华民国时期	(225)
第六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229)
第七章 黄帝陵楹联	(242)
第一节 黄帝陵和轩辕庙楹联	(242)
第二节 当代公祭民祭黄帝陵楹联选	(242)
第三节 征集黄帝陵楹联选录	(246)
第八章 整修黄帝陵工程	(286)
第一节 历代整修黄帝陵纪事	(286)
第二节 当代整修黄帝陵工程	(289)
第三节 古柏保护	(304)
第四节 黄帝陵基金会	(312)
附录一：黄帝的文献资料	(332)
附录二：黄帝的民间故事	(477)
附录三：黄帝研究著述选录	(510)
后 记	(520)

引言

这部《黄帝陵志》的一部分内容涉及中国历史上的炎黄时代，另一部分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帝文化。对于炎黄时代和黄帝文化的认识，是编纂这部《黄帝陵志》的前提和基础。现就这两个问题作一扼要说明作为引言。

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是从炎黄时代开始的。炎黄时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传说，经过两三千年口耳相传，从西周开始写入古代文献。这些载入古代文献的历史传说，通常称为传说史料。这些史料表明：炎帝和黄帝的父亲是少典氏族的成员，母亲是有蟠氏族的成员。炎帝在姜水一带长大成人，黄帝在姬水一带长大成人。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在今天的陕西宝鸡境内，姬水应当距离姜水不很远。炎、黄两个部落兴起于我国西部黄土高原地区，各有一支向东迁徙，进入中原。他们到达中原腹地以后，与今天山东、河北、河南交界地区的九黎部落发生冲突。先是炎帝部落被九黎部落打败，接着炎、黄两个部落联合起来打败了九黎部落，杀了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后来炎、黄两个部落又发生冲突，黄帝部落打败了炎帝部落。失败的炎帝部落大部分离开中原，迁往江淮一带以至长江以南，也有一部分迁往山东海滨；胜利黄帝部落则成为中原盟主。炎黄时代各部落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无论是军事斗争中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在中华大地上继续生存发展，共同创造着古老的中华文明。炎帝部落的重要贡献是发展了原始农业，发明了陶器，发明了医药并创立了日中为市的交易市场。黄帝部落最值得注意的发明是文字、衣冠和若干社会制度，如最初的财产制度和职官行政制度。这些发明创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炎黄时代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

传说史料一度被认为是出于战国至秦汉期间人们的臆造。近半个多世纪考古的发现却提供出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传说史料是基本可信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已经发现的7000多处遗址和已经发掘的400多处遗址中，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也就是距今6000—4000年之间，正是传说史料中所说的炎黄时代。这期间的考古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还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文化，以及长江下游的崧泽文

化和良渚文化。这些考古文化的材料,可以从经济、文化、政治方面说明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

无论黄河流域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6000—4000年之间的遗址中都有大量多种农具出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收割农具陶刀、谷物加工农具石碾,庙底沟遗址中还发现了使用双齿木耒的遗迹,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未曾见到过的。使用双齿木耒遗迹的发现特别可贵,因为木质农具容易腐烂,不能遗留至今,用耒耜耕作的痕迹十分偶然地遗存下来,又十分偶然地被发现,几率非常小。反过来说,这样的个别发现能够说明当时使用耒耜远远不是个别现象了,炎帝时发明耒耜的传说史料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在长江中下游诸文化遗址中,特别是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具种类多,数量也多,而且很有特色。例如,钱三漾遗址中出土了“三角犁形器”、“耘田器”,是其他遗址中所没有的,而马桥遗址中出土的石质和骨质农具之精致,可居新石器时代农具之首。这期间出土有谷物的遗址较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幅度增多,而出土粟的遗址多数分布在黄河流域,出土稻的遗址多数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到20世纪末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粟的27处,在距今6000—4000年间的有20处以上,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有19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稻的遗址45处,在距今6000—4000年间的有40处以上,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的有39处,而又有27处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研究证明:粟的种植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诸部落是种植粟类谷物的发明者和推广者。稻的种植起源于我国长江流域,东南诸原始部落是种植稻类谷物的发明者和推广者。

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史前畜牧业是作为种植农业的附属生产部门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在我们所论的时代,畜牧业已相当繁荣。后来中国人说的“六畜”,这时除马是否驯养还不能确定外,狗、猪、羊、牛、鸡都已能够驯养。养猪是中国史前畜牧业的特点,这期间各个文化类型的遗址中无例外地都有家养的猪的遗骸出土,越是较晚的遗址中出土越多。有人统计,在庙底沟遗址的26个早期龙山文化灰坑中出土的猪骨骼,比同一地点168个仰韶文化灰坑中出土的还要多。而甘肃永靖齐魏家的46座齐家文化墓葬中,有430块猪下颌骨随葬,最多的一墓达68块。当时种植农业已经能够为大量养猪提供足够的饲料。

传说史料记载,神农氏时没有文字,人们结绳记事,黄帝时发明了文字,仓颉是发明文字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人。我们知道,文字有形、音、义三要素。绳结充其量只能有大小和个数多少的不同,与文字距离很大,不能直接发展为文字。考古材料证明,文字的先驱是刻划符号。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有刻画符号的遗址至少有17处,时间不早于仰韶文化,分布地域则很广,包括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在香港、台湾也有发现。发现刻画符号标本最多的是仰韶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和

大汶口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姜寨、半坡、北首岭遗址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270多件标本,50多种符号。马家窑文化柳湾墓地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好几百件标本,100多种符号。这两种文化的刻画符号有很大的一致性,说明它们已经具有广大地区范围里的人们共同承认的含义,具备了文字的某种因素。大汶口文化的刻划符号,目前发现了16件标本,包括8种18个符号,它们的风格更接近实物形象,其中有的符号已被一些学者作为文字释读了。公认的最早文字标本有两件:一件出土于河南登封,是一个泥质薄胎平底黑色陶器的底部残片,外面刻有一个与甲骨文、金文的“共”字字形相似的字,是一个会意字“共”字,它可能是器物所有者所属的氏族的名称。另一件发现于山东邹平,是一个泥质灰色平底大陶盆底部残片,上面刻有5行11个字,笔画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规则,刻画也有一定章法。其中有象形字,也有会意字。研究确定,这件标本属于龙山文化遗物,距今有4000年以上,成为炎黄时代发明文字的最切近的实物证据。

传说史料对炎黄时代的艺术有许多记载,包括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如说炎帝时创作了名叫《扶持》的乐舞,黄帝时创作了名叫《咸池》的乐舞。炎帝时发明了瑟、五弦琴和七弦琴,黄帝时发明了鼓、磬、铙、角、鞀、钲等乐器和正五音的律管,还有画着神荼、郁垒与虎的门画以及用来威镇天下的蚩尤画像。属于表演艺术的音乐、舞蹈是时间性艺术,时过境迁便不复存在。属于造型艺术的绘画却有大批实物遗留下来,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可以说明当时艺术发展的水平。这样的实物主要是陶器和玉器。陶器上图画的内容极为丰富,仰韶文化陶器上的鱼、鸟、鹿、蛙、鲵鱼、壁虎形象生动,马家窑文化陶器上的植物花、叶、莢实等纹饰富于变化,从不同方面反映着当时的经济生活和自然环境。特别有趣的是陶器上的人物画,例如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陶盆,不但是我国造型艺术最早的杰作,也透露出当时表演艺术的繁荣。还有一件马家窑文化的人头形器口彩陶壶和一件仰韶文化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都将绘画与器形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人物造型。前者如一名强壮的武士,后者如一位衣着华丽、体态娴静的短发少女形象。这两件陶器在绘画史、雕塑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陶器、玉器艺术已开始形成中国造型艺术的特点,显示出中国造型艺术的发展方向。例如,注重写意的中国造型艺术传统,在这时已见端倪。半坡人面鱼纹图,将两条活生生的鱼画在人嘴左右两边,是生活中绝难见到的景象。这幅画不注重写实,而注意表现人与鱼的关系,灌注着人的愿望和情绪。再如,善于表现动态的中国造型艺术传统这时也已出现。不熟悉史前器物图案的人也容易察觉,中国陶器、玉器图案多用弧线、弧形、圆点构成,给人错落运动之感,与两河流域古器物图案多用平直线条构成而造成的严整静止之感迥异其趣。动感的构图以连续不断的运动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表现出中华民族奔腾不息的进取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

传说史料有一些记载了炎黄时代原始宗教的状况。例如传说史料记载炎帝“人身牛首”，黄帝战蚩尤时以雕、鸮、鹰、犍为旗帜，有熊、罴、豸、虎参战，反映着图腾制度的存在。又记载炎帝死后托祀于灶神，有年终举行蜡祭合祭百神的习俗，反映着多种自然神并存。至于炎帝重卦作易以及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的记载，则反映着当时卜筮、巫术的流行。传说史料反映的这些原始宗教状况，总体上也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以仰韶文化为例。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动物图案分布有地域性，华山以西以鱼为主，华山以东以鸟为主，华山周围出现鱼鸟结合的图案。极有可能，鱼和鸟分别是华山以西、以东地区氏族的图腾。河南临汝出土的一件陶瓷棺上画着一幅鸛鸟衔鱼与石斧组成的画，很可能是鸛氏族纪念祖先战功的作品，显现出祖先崇拜的意识。至于河南龙山文化、陕西早期龙山文化遗址中出现石且、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男性裸体像陶罐，更是祖先崇拜的遗物。良渚文化大量出土玉礼器，以璧、琮、璜为典型器物。依文献所记，璧用于祭天，琮用于祭地，璜用于祭方位神。良渚玉礼器也反映着原始宗教多神并存的状况。良渚文化玉器上多见的那种被称为“良渚神徽”的人形兽形结合的图样，当然更是原始宗教的遗物。

传说史料记载的炎黄时期大规模战争、黄帝设官治民、划分等级、建立财产制度，是政治权威出现的直接证据。而有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提高的记载，提供了间接证据，说明国家因素出现已经具备了可能。在考古材料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各部落的原始农业都有长足发展，家畜业兴旺，陶器、玉器工艺提高，可以推测私有财产出现已成为必然。常被作为政治权威形成的标志的各种现象的出现，也都取得了考古资料证据。这些现象包括：（1）金属的使用。仰韶文化半坡、姜寨遗址中就已发现了铜质残片，龙山文化多处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铜渣、炼铜的坩埚的残片。（2）礼器的大量出现。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都发现有大量玉礼器。（3）城堡出现。龙山文化出现了有夯土版筑墙和石块垒砌成围墙的小城堡，如登封王城岗城址、淮阳平粮台城址、寿光边线王城址等。（4）出现反映贫富分化的现象，即随葬品多少悬殊。大汶口墓葬中随葬品悬殊已很显著，龙山文化中有木质葬具的大墓与为数众多的小墓随葬品悬殊更加突出。（5）文字的形成。这些现象中的某一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单独出现，并不足以说明政治权威兴起，但当它们在一个时代里都已出现的时候，就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考古学界公认：中国的诸新石器文化不断发生交流、融合和分化；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文明时代。依据对于传说史料与考古资料所作的对比研究，我们认为炎黄时代上限比中国新石器时代上限晚，不包括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 6000—4000 年之间。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炎黄时代之后至今的四千年间，人们从炎黄时代及轩辕黄帝的传说史料出发，结

合各个历史时代的需要，不断进行阐释和总结，形成和发展了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同根共祖的观念。它最早表现为以夏、商、周三族为主体的华夏各族皆为黄帝族后裔的观念。《国语·鲁语上》记载：“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颡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韦昭注：“舜，当为咎字之误也。”），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咎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由此可知，夏、商、周三族不仅祭祀本族的先王、先公，还进而将他们的族源上推到黄帝族，承认他们是黄帝族的后裔。这个历史现象真正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表明夏、商、周三族有着互相认同意识和一致的归属心理。这种民族认同意识和一致的归属心理的形成，是有深刻历史根源的。三代历史上夏、商、周三个朝代相继更替，而夏、商、周三族始终共存着。每个朝代统治时期，尚未取得共主地位或已经失去共主地位的另外两族，同时也在中原大地生存发展。三代的疆域，商大于夏、周大于商，后一个朝代包括了前一个朝代的疆土、人民。三代1000多年间，夏、商、周三族之间有联合和归附，也有冲突和征服，但始终共生共存。最后兴起的周族的祖先曾任夏朝的农官，又曾是商朝的方伯。周朝建国后，夏、商二族又都成了周朝的诸侯。无论联合和归附还是冲突和征服，都导致了三族融合，从而形成稳定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华夏各族有共同的农业经济。夏朝的中心地区豫西、晋南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西周的中心地区镐京至洛邑之间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商代建国以后农业也成为主要经济部门。从传说史料看，三代农业都是炎黄时代开创的种植农业的继续和发展。从考古学来看，仰韶文化衰落以后，中原地区代之而起的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都是仰韶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交融的结果。有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历史渊源的夏、商、周三族，形成文化上的互相认同意识和一致的归属心理，是具有必然性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夏各族互相认同的意识扩大成为中华各民族互相认同的意识，中国人自号炎黄子孙是中华各民族有着一致的归属心理的表现。三代以后中华民族的成长经历了分合聚散的复杂过程，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中华民族凝聚范围越来越扩大，互相依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向心力越来越加强。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旗帜。在春秋时期的“华夷之辨”中，孔子提出“用夏变〔于〕夷者夷之，夷而进于中国者中国之”（《路史·国名记》），这种华夷观提倡文明、反对野蛮，主张中华各民族互相亲近和共同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战国秦汉间文献中出现的五帝世系实际提出了一个中国古史系统，真正的重要意义也在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司马迁十分重视这些材料，依据《国语》、《五帝德》、《帝系姓》、《五帝系谍》等作《五帝本纪》和《三代世表》，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功不可没。后来的汉族自认是黄帝的后裔自不待言，许多少数民族也自认是黄帝之后。于右任先生说：黄帝“子孙之蔓延于各地也，如汉族固为其苗裔，而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禹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族之鲜卑。金

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清，满清则金人之后也，是皆近世治史者所能考信。是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黄帝功德纪·序》）

黄帝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是崇尚文明开创精神的观念。司马迁用“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十二个字赞颂黄帝功德，就是说黄帝在治理自然环境、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建立社会制度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建树。这个黄帝功德的颂词表达了崇尚文明开创精神的观念，也是对黄帝文化精神实质的一个概括。黄帝文化涉及科技、道德、制度等许多领域，在每个领域中都贯穿着伟大的开创精神。善于开创新事物、新制度，以解决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满足历史发展的需要，从而把历史推向前进，这是黄帝文化的特质。这里仅举一例：《汉书·艺文志》中，以黄帝君臣之名为书名的著作有25种之多，《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中各有6种，《方技略》中有7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数术略》的《天文》、《历谱》、《五行》类图书中都有以黄帝君臣之名为书名的著作，《方技略》中的《杂占》、《医经》、《医方》、《房中》、《神仙》类图书中也都有以黄帝君臣为书名的著作。这些著作几乎遍及中国古代科学的所有领域。这些战国秦汉人的科学著作以黄帝君臣之名题名，说明传说史料中关于黄帝君臣发明创造的记载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致战国秦汉间人普遍将他们看成伟大的发明家，愿意将许多科学著作挂在他们名下。这样的古代科学著作不是黄帝时代所能有的，却是黄帝文化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古代科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是医学，而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常常可见黄帝的身影。不仅医学著作中常常提到黄帝，与古代医学有关的著作如《列仙传》、《列子》、《抱朴子》也多有关于黄帝的文字。这类著作称黄帝之道为“养身治物之道”（《列子》卷上），强调了“养身治物”在黄帝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医家以黄帝为鼻祖。元朝甚至规定由十大医师主持祭祀黄帝的典礼，更加突出了医学在黄帝文化中的地位。我们从这里看到，崇尚文明开创精神，崇尚科学发明创造，是黄帝文化的特质。

黄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特殊之点在于它是超学派、超区域的，不是某个学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的思想体系，也不是某个区域的文化（如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总概括。黄帝文化内涵丰厚，而其最根本的特质是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精神和开创精神。

黄帝文化与炎黄时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创时代，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方面都有首创之功。炎黄时代也是中国先民社会生活空间迅速扩大、互相联系空前加强的时代。由于黄帝部落取得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领导地位，促使炎黄集团与九黎集团融合，人们的社会生活突破原先的部落范围，为中国历史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炎黄时代为黄帝文化提供了基质，黄帝文化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与炎黄时代的古史分不开的。同时，黄帝文化是与三代至今4000年

中华民族发展史联系在一起的。四千年来，中国经历了几个社会形态更替，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方面不断创新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加强，为黄帝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黄帝文化则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不断丰富。黄帝文化中的许多观念和具体材料是黄帝时代所没有的，在古史研究领域不可采信，在后代文化史领域则仍然有重要价值。注意黄帝文化与炎黄时代古史的联系和区别，是黄帝问题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